

梁启超：两访南通传播民主科学精神

□庄安正



梁启超



1922年,在南通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全体代表合影。前排右四为梁启超,后排左三为梁思成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梁启超与南通,主要体现在与南通状元张謇的交往上。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状元及第。梁启超此时恰奉康有为命进京,“与京师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这里的“名士”中就有张謇。

甲午战争爆发后,梁启超知道张謇与翁同龢关系密切,建议张通过翁劝告李鸿章对日主战。康有为因撰《新学伪经考》遭人参劾,处境危难。梁启超又受嘱请求张謇向翁同龢求助。“公车上书”后,康、梁在北京建立强学会,上海强学会也随之建立,张謇欣然同意列名发起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维新变法步伐加快,梁启超与张謇在改良社会的内容、途径等方面产生明显分歧,张对梁由声援改为劝导“勿轻举”。变法前夕,张謇预料时局将生大变,黯然离京。张謇虽自以为与梁等“是

群非党”,并无关联,其实立于内心,对梁启超怀有很大的同情。事实上,张謇也已被朝廷某些人视为危险分子。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海外,两人交往一度中断。

民国建立,梁启超自海外回国,张謇等在天津迎候三天,并多次前往拜访。两人积极参加了组党参政活动。1913年,梁启超的民主党与张謇的统一党、共和党合并组成进步党,两人同时被推为理事。这一年,梁、张均成为熊希龄内阁的重要成员,分任司法部总长与农商部总长。1914年2月,熊希龄在袁世凯下属逼迫下辞职,梁亦连带辞职。梁启超与张謇共同理政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私交很是频繁。梁女出嫁,张謇前往庆贺;梁父去世,张謇前往吊唁。两人还同往观赏梅兰芳主演的京剧《贵妃醉酒》。良好的私交还反映在张謇日后对梁启超的经济援助上。据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在他(指梁启超)经济状况最窘迫的当口,我父还帮助他好几回。”1915年上半年,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暴露,张謇相继辞去两项职务,与袁决裂。梁启超亦举起反袁倒袁旗帜,支持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

1918年,张謇在上海建立国际税法平等会,正值梁启超启程赴欧考

察之际,张謇力邀梁参会,并在欢迎大会上热忱希望梁偕赴欧之机宣传中国改定税为国定税的理由,梁启超慨然接受委托。双方还表示在国内外互通信息,互相声援。1919年,梁启超抵达伦敦时,国际联盟同志会在国内建立,梁启超任理事长,张謇任理事。梁启超在巴黎得知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中日间并订有密约后,立即通报国内,张謇随后建立国民外交协会,并请梁启超主持。梁启超又迅速电告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约。双方的配合与行动,为五四运动发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曾两次到访南通。第一次在1920年,梁启超自欧洲考察抵新加坡时,张謇邀请梁启超回国后访问南通。梁启超抵通后,张謇“假座更俗剧场欢迎梁君,到逾千人,推张晋庵为主席,演说欢迎词。梁答谢词毕,演说德皇与协约国战争始末情形,而于假道比利时一段,述之尤详。欢迎会终,各界恭请梁君……至桃之华大餐馆午餐”。梁启超带来了比利时希望与中国共同筹建航业及贸易公司的重要消息,希望由南通来承担与比利时合建这一公司的任务。南通大生公司时处鼎盛时期,张謇听到这一消息甚为振奋,与梁启超“言谈颇久”,高度认同梁启超的建议,认为“此事与国际贸易有极重要之关

系,有此机会若不组织加入,恐吾国将来永无海外直接贸易之事”。遂即与大生企业股东协商,决定冻结上年股东余利作为资金,以上海吴淞为根据地筹建公司。这一计划后来虽存在复杂原因未能实现,但不失为国人面向世界,从沿海走向大洋、从浅蓝走向深蓝的一次重要尝试。

1922年,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在南通举行,梁启超再访南通。这次年会本计划在广州举办,因广州时局动荡,科学社向张謇求援,张謇当即表态欢迎科学社到南通召开年会。由于梁启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加上南通民众对梁早已熟稔,梁启超成为年会期间最为活跃的明星人物。在通崇海泰商务总会大厦举行的年会开幕式上,梁启超是第一个做演讲的科学社成员,讲题为《科学之精神与东西之文化》,时间长达两小时之久。后来,梁启超又应南通四社团邀请做第二次演讲,题目是《先进者之新觉悟与新任务》。梁启超说:“南通是我们全国公认第一个先进的城市,南通教育会和各团体是我国教育界之先进者,他们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国人共知。也不必我来颂扬,我今日来讲,也无非是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意思。”“南通诸君,要觉悟自己地位之重要,任务之重大”。这天天气炎热,但会场内座无虚席,听众情绪始终高涨。



史海回眸

如皋历史上的疫情防控

□程太和

一、疫情

明、清至民国时,如皋主要有天花、霍乱、恶性疟疾及血吸虫病等传染病。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如皋“大饥大疫”。清嘉庆、道光年间,“如皋疫痧大流行,害人甚速,有不及一日即毙者”。清光绪二十八年秋(1902年秋)如皋东乡(今属如东县)发生大旱灾,瘟疫流行,染者死亡甚众。民国16年(1927年),如皋县境内不少地方出现狂犬病。民国20年(1931年)后,县府明令禁养野狗,设立野狗关押所,狂犬病发病率有所降低。民国25年(1936年)9—10月,恶性疟疾大流行,遍及东乡双甸、岔河、马塘、掘港四个区(现均属如东县)及白蒲区部分乡村。其中,马塘区虹元乡有一个村庄叫“百担圩子”,共有91户,271人,染病人数竟达243人,死亡110人。死亡之惨烈,不忍目睹。据当时南通《政情月刊》刊载:此次疫情,“患者近十万,死者逾八千”。民国29年(1940年),如皋城区发生一种流行病,中医称之为“疫痧”,西医称之为“猩红热”。民国35年(1946年)仲夏和秋末季节,如皋城区发生霍乱大流行,起初只见一两例、三四例,后逐日增多,传染猖獗,死亡率随之上升。一时弄得棺材店里忙着不迭,如皋育德堂的棺材被拾一空。刚死亡的患者等着做棺材。天气炎热,丧家惶然,无可奈何。直到秋末降雨,疫势稍杀,患者逐渐稀少而止。

二、防控措施

天花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不仅传染面广,而且危害性大。民国时期,如皋城专门替儿童种“牛痘”的有两家:一家是严家湾子西侧沈家巷头上的汪鸿皋,其子汪惠民,两代相传替人种“牛痘”;另一家是北门外的姜捷三。汪家是城里和西南乡的业务多、名声广。姜家是北门花市街及东北乡的业务多。汪鸿皋家的墙壁上钉有“汪鸿皋引种牛痘”白底红字的铅皮招牌,一年春秋二季“刷黄”(即张贴木刻板黄纸印的招牌,如皋汪鸿皋引种牛痘”,右边加填某月某日浆期,左边是地址的广告)。民国25年(1936年),南通行政专员公署设立种痘传习所,所长叫席席丰,招收南通、如皋、崇明、海门、靖江、启东6县的医务人员接受有关天花的理论知识和接种牛痘的技术培训与实习,时间十天,经考试合格后发给结业证书,回原县推广种牛痘业务。如皋县派往学习的医务人员为陈君豪、王斗南、汪惠民、黄应昌、宋永祥、陈仕任6人。民国25年(1936年)9—10月,如皋东乡恶性疟疾大流行,如皋中医公会随即选派内科中医黄星楼、陈爱棠、宋永祥、邹云甫、卢震春、刘应龙、朱明轩、范凤梧、陈其华等12人分成6个组轮流前往疫区应诊。南通医界亦派医生携带多箱“双桃牌奎宁片”到疫区参加救治病人。民国35年(1946年)仲夏和秋末季节,如皋城区发生霍乱大流行,聘宋永祥、徐乃棠、何绍光、贾莅中、陈其华、祝季平等为义务医师,组成“如皋时疫施诊所”应诊。

1949年1月如皋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兴卫生防疫事业,狠抓以天花、霍乱、鼠疫为重点的25种传染病防治工作。1949年始,全县未发生霍乱疫情。1953年天花基本绝迹。1959年秋初,南通地区发生白喉。由于治疗与预防并举,措施得力,很快即被控制。其时,如皋县人民医院指定专门医师,另辟病房收治患者。如皋县人民政府卫生科还从如城公社医院、东陈区医院各指派一名医师,前往设在新潮镇的“南通白喉隔离治疗站”学习十天,回原地从事预防治疗工作。如城公社临时建立了“白喉隔离治疗站”,用中药“加减银翘散”或“养阴清肺汤”给患者内服,以“秘制雄黄散”吹喉,杀菌去腐;再用“青霉素”针剂注射以抗菌消炎,防止并发症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白喉即被控制。1956年6月1日建立如皋县卫生防疫站,设于如城东郊,后迁城内。1962年迁回原址,占地面积0.6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0.42万平方米。1962年11月,如皋县防疫指挥部成立。1976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1978年开始,县防疫站重点加强计划免疫和基础免疫工作。1981年始,无白喉发生。1984起,无脊髓灰质炎发生。消灭血丝虫病,经省考核验收,达到基本消灭标准。麻风病防治达到国家卫生部规定标准。1988年,全县共完成55.6万份66万人次的生物制品接种任务,建卡率98.2%,卡报率94.03%,四苗(卡介苗、脊髓糖丸、百日破三联、麻疹疫苗)覆盖率91.9%,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病和传染病的流行。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达85%,实现了国务院提出的目标。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乙型脑炎、麻疹、百日咳等传染病发病率有较大幅度下降,人民的健康指数日益提高。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名人的籍贯故里问题

□黄泳



很多名人由于出生地、生活地、祖籍等均不在同一地,他们的故里问题常常成为争议焦点。如近年“李白故里”“诸葛亮故里”“曹雪芹故里”等都是如此。在南通地区,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

作为南通地区最著名的人物,张謇的故里存在南通和海门两种。尽管海门现为南通市的一个区,但从张謇出生的1853年到其去世的1926年,南通和海门都自始至终属于互不统属的两个地方:清末南通为通州直隶州,海门为海门直隶厅,行政区划为同级。北洋军阀时期,南通为苏常道下辖的南通县,海门为沪海道下辖的海门县,不但平级,而且区划关系还较为疏远。再加上籍贯通常表述为“某省某县”,因此“江

苏南通”与“江苏海门”是要有区分的。

张謇出生于海门,但我们通常以原籍作为故里,而非出生地。张謇祖上几代生活地有石港、金沙、西亭等,无论怎么变化,都未离开当时的通州直隶州,也均在今天的通州区境内。张謇父亲迁居海门只是一段小插曲。并且张謇后来长居南通,事业中心也在南通而非海门。因此张謇的籍贯为南通无疑。事实上中学历史课本一直标注张謇为“江苏南通人”,并非“江苏海门人”。

被标注“江苏海门人”的最著名的人物是卞之琳。卞之琳家并非世居海门,但他的祖父当时已从别地迁徙海门老汤家镇经营生计,至卞之琳本人已是第三代,因此卞之琳不仅仅出生地是海门,籍贯也是海门,南京溧水只是祖居之地。卞之琳年少时作文“吾乡但平畴广野,无山川之胜”,这里的“吾乡”就是海门。

李渔是另一位籍贯有争议的名人。在如皋,纪念李渔的方式比较多,比如城东设有一条李渔路,市中心还有一个李渔纪念馆。关于李渔的出生地说法并不一致。有说其父幼年就跟着李渔祖父到了如皋,有说李渔出生在兰溪,后来才跟随父亲到了如皋。一般的出版物中更多地把李渔视为浙江兰溪人。李渔曾赴兰溪参加童子试,到杭州参加乡试,这些都说明他籍贯在浙江。

不过,李渔本人对他的如皋人与江苏人身份是有着认同的。他曾经称兴化人李雨商和他是“同姓而兼桑梓者也”,姓氏一样,家乡一样,这间接证明了李渔把自己视为江苏人,如皋人了,毕竟这里是他青少年生长之地。有趣的是,江苏省城南京和浙江省城杭州,都是李渔长期客居之地。

最有争议的还属柳敬亭。一般史料中关于柳敬亭的记载都说他是泰州人。黄宗羲、吴伟业、余怀等同时代名人的记

载都是如此,丝毫没有提及柳敬亭与南通相关。目前很多资料或称柳敬亭为“南通人”,或称“祖籍南通”,源于1927年钱嘯秋在《小说世界》刊载的《柳敬亭之世系》,后来很多著述就据此认为柳敬亭是通州余西人。

柳敬亭为南通人的可能性不大,但“祖籍南通”和“泰州人”身份并不矛盾。比如张謇虽是南通人,但“祖籍常熟”,卞之琳是海门人,但“祖籍溧水”。不过关于柳敬亭,即使是数代以前的“祖籍”,也同样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是南通。

当然,由于历史区划原因,也有一些名人是两地共有的。比如韩国钧,南通与泰州的地方史料均反复提及这位先贤。这与海安历史上长期属于泰州,现今却又为南通代管有关。《泰州通史》里同样大篇幅记录海安青墩遗址,将其视为泰州早期文明的代表。海安成为在文化上联系南通与泰州的重要纽带。

从传说到古诗,度军井未曾写为渡军井。因为有岳飞的传说,人们可理解为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写作“渡军井”也无妨。加上战争年代,军中有文化的多为外地人,对于本地文化未必熟稔,故误写为“渡军井区”。既然当年,红色报刊均用“渡军井区”,那么今日我们回顾如皋的红色历史,此地写为“渡军井区”或“度军井区”,都应该可以的。

抱恨泪沾衣。”

心大会 检举复辟地主 特务被迫坦白》,又如1948年3月《如皋大众》的《永不忘人民功臣,十二乡荣称烈士英名》:“渡军井区大洋乡改为胡芝乡。”

有趣的是,如今又有些文章记为“度军井区”。百度搜索如皋景点,只有“度军井”,没有“渡军井”。度军井与岳飞的故事,已为人熟知,民国《如皋县志·卷三·古迹》也有记载:度军井,在县治西十里许,地名圣井栏。传说井中水

浅,常常枯竭,只要用力敲击井栏,就有水源源不断地渗出来。岳飞率军过此,千人饮用井水,并未枯竭,故名度军井。元代,淮南王听说此事,命人将井栏取回家中,用力敲击,但无水流出,便让人送回来。时至民国,众人又将此地呼为圣井栏。诗人吴铠作有《度军井》:“鄂王经略海东归,圣井天留慰渴饥。号令山初移帐至,精诚泉若刺刀飞。穹庐冰雪难填恨,暗峡风波未息机。转歎一门忠孝事,银瓶



因为喜好搜集如皋红色文献,笔者多次在红色报刊中看得一个重要的地名:渡军井区。譬如刊于1945年9月《苏中报》的《如城解放战中的如西人民参战热潮》,第85期《前线》报的《如皋渡军井区发展综合斗争 五乡群众召开开